

[美]斯蒂芬·罗西斯著 余永定 吴国宝 宋湘燕译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



中财 B0023753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

[美] 斯蒂芬·罗西斯 著

余永定 吴国宝 宋湘燕 译

余永定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叶南奇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 勤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
Hou Kaiensi Zhuyi Huobi Jingjixue
〔美〕斯蒂芬·罗西斯 著
余永定 吴国宝 宋湘燕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92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 7·5004·0805·6/F·159 定价：1.9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罗西斯的新作。书中探讨分析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失误，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作者所论述的内生货币供应理论及该学派的政策主张，对于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及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内 容 简 介

序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第一章 导论 | (3) |
|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 (3) |
| 凯恩斯关于财富分配的早期观点 | (5) |
| 《通论》中的财富分配问题 | (7) |
| 后凯恩斯主义剩余经济学 | (10) |
|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 | (14) |
| 第二章 货币的特性 | (17) |
| 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 | (17) |
| 凯恩斯论不确定性 | (19) |
| 不确定性和时间 | (21) |
| 货币的特性 | (25) |
| 货币和债务 | (27) |
| 萨伊定律的人为恢复 | (30) |
| 第三章 货币需求和利息率 | (34) |
| 外生的货币供应量 | (34) |
| 工业和金融部门对货币的需求 | (35) |
| 融资动机 | (41) |
| 融资动机的数字模型 | (45) |
| 自主投资增长的影响 | (48) |
| 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 (53) |
| 利息率决定的加成理论 | (58) |

| | |
|--------------------------|-------|
| 第四章 外生的货币供应 | (71) |
| 货币—收入联系 | (71) |
| 收入—货币联系 | (74) |
| 拉德克利夫一般流动性命题 | (77) |
| 第五章 温特劳布—卡尔多内生性模型 | (82) |
| 温特劳布内生性模型 | (82) |
| 卡尔多内生性模型 | (88) |
| 一个利用图形进行的说明 | (92) |
| 内生货币供应的流通速度成分 | (96) |
| 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战后行为 | (98) |
| 关于内生货币供应的一个替代理论 | (102) |
| 第六章 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政策含义 | (109) |
|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109) |
| 意志的丧失 | (112) |
| 直接的货币控制 | (115) |
| 选择性控制建议 | (120) |
| 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 | (125) |
| 某些进一步的想法 | (130) |

序 言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远不是一种已经最终取得一致意见的理论。本书是对它的某些主要论点的批判性概述。然而，应该记住，现代货币政策可以说是在1951年财政部—联储协议生效四年之后才开始的。在1955—1957年的扩张期间，斟酌使用的公开市场业务第一次成了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货币政策只有大约三十年的历史。这是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而且，这一冷峻的事实应该清楚地铭记在我们心中。

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货币政策学派。一派是主张IS—LM微调模型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另一派是在60年代开始迅速爬上支配地位的货币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则拒绝上述两派观点，而这种拒绝主要表现为它对货币数量说中的因果关系箭头的颠倒：货币供应被看作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不是与此相反。这意味着一种货币供应的内生理论。更准确地说，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换言之，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的箭头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正如本书将证明的，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① 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

① 以下简称《通论》。

如果说在本书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的话，那么它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后凯恩斯主义者所忽视的金融创新问题。应该把它吸收进内生货币供应理论之中。第五章是这样做的一种尝试。如果说本书有一个最重要观点的话，那么它就是，如果不同时助借于有选择的信贷控制，收入政策本身是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这是在第六章所得出的结论。以前各章都已表明，得出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无疑，本书的上述内容和其他内容都将是有争议的和反映作者个人观点的，并非所有自认为是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人都会完全同意这些内容。然而，对于一种正在斗争中找寻自己的理论来说，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之中的。

如果这不算是一种奢望的话，我希望本书至少能把某些分歧摆到桌面上，以便阻止“主流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从实质上讲，这种崛起只能是荒谬的。

我要特别感谢勒莫内大学的南希·J·伍尔威克，因为她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也要感谢我在瓦萨大学的学生们，因为他们耐心地容忍了我对早先的手稿的不断修改。

我愿借此机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承熙教授表示感谢。罗承熙教授对我早先的手稿曾提出过颇有助益的意见。

斯蒂芬·罗西斯

第一章 导 论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大凡革命都有一种将其先驱者吞食，而由一些自命不凡的师承者取而代之的可憎倾向。这些师承者打着革命的旗号，似乎在巩固革命的成果，但其目的只不过是在这一过程中背叛革命。在思想领域中，凯恩斯革命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尽管在这个例子中这一革命的创造者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具有革命性。按照琼·罗宾逊夫人的说法，凯恩斯本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通论》的重要性。1936年《通论》发表之后不久，在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关于《通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的激烈争论。事实是，凯恩斯从来就没有同他在剑桥大学就学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所受到的新古典主义训练彻底决裂过。新古典主义对他的影响清楚地反映在他的《通论》的开头几页之中。虽然他拒绝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命题Ⅱ”，即劳动的供给对实际工资存在着正向的依赖关系；但他并没有公开拒绝“命题Ⅰ”，即对劳动的需求同实际工资水平存在着反向联系。这种同新古典主义的藕断丝连的决裂，造成了一系列有害的后果。尽管如此，凯恩斯拒绝接受所谓所有失业都是自愿失业的新古典主义观点，这一事实本身仍不失为一项重大突破。确实，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是凯恩斯革命的基础。然而通过冲淡凯恩斯对于有关市场力量的存在的各种命题所作的保留，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有

可能争辩说，凯恩斯接受了命题 I，因而并没有违背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思想，即所有厂商都面对着递增的成本曲线，而这一曲线显然是同完全竞争市场上递减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相对应的。这种从新古典主义出发的引申，使得对凯恩斯的断章取义变得容易得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这种“杂种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同较传统的、允许就业不足情况下的均衡存在的战后早期凯恩斯主义模型相比，它要右得多，尽管该模型假定非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优组合加以抵消。在更为极端的凯恩斯主义一般均衡模型中，分配成了在供求“律”支配下运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定价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联立方程组和瞬时调整的前凯恩斯世界。经济再次被看作是自然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而对边际生产力“规律”的分析则决定了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即各尽所能，按贡献分配。社会产品的分配就这样由一些貌似不偏不倚的经济学“规律”加以合法化了：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工会、政府或大企业对于现存秩序的任何干预都只能把事情搞糟。

很容易接着得出下述方便的和自我辩护性的结论：劳动者旨在得到比市场所能够分配给他们一份更大的蛋糕的任何企图都必将对利润，从而对资本积累造成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率将随之而下降，资本主义制度将不再能够通过增长而增加福利的绝对水平，从而不再能够使收入分配问题非政治化。因此，资本主义将迅速陷入涉及其合法性的严重危机的阵痛之中。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活力依赖于持续的增长，而后者反过来又依赖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劳动对于这种显然是不公正的分配的默认。

凯恩斯关于财富分配的早期观点

在1920年，凯恩斯完全同意：“到1914年8月为止的时代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的一个多么辉煌的阶段！是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人们依然处于劳动艰苦、生活艰辛的状况中。但是，从所有的迹象来看，他们都基本上满足于这一命运”。^① 凯恩斯和他的同代人正是在“这一经济黄金国和乌托邦”中成长起来的。“宣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文化对立的以及谋求垄断、限制和排他性的种种计划和政策，这些即将扮演伊甸园中的蛇的角色的东西”，凯恩斯写道：“在当时充其量只不过是报纸上的……一种娱乐而已，它们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日常进程看上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社会心理”完全是为了保证资本的最大限度积累“而在社会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尽管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在继续得到改善，但社会的构成却使增加了的收入落到了那些最不可能去消费它们的阶级的手中。”正是“投资的力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对眼前消费的喜悦”成了以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驱动力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贵族们把财富大量挥霍在豪华的宅邸、奢侈品以及赏心悦目而又华而不实的东西上，而这些东西对于经济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则毫无助益。一般法则是静止，而不是增长。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奉新教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积累实际资本而抑制了自己的消费。根据这一理论，财富的平等分配将会排除“固定资本大量积累”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积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年中给全人类带

^①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1920年，英文版，第10—11页。以后的引文出自同书，第12，18—22页。

来了难于估价的巨大福利。确实，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固定财富的大量积累和资本的改善成为可能，而这种积累和改善则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所有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也正在于此。”这种杰出的成就是以资产阶级的节制消费为基础的，因为节制消费所形成的储蓄为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社会福利的巨大增加应主要归功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工人的主要贡献是消极地接受了使之成为可能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而这样做是符合工人自身利益的。凯恩斯这样写道：

因而，这一非凡制度的成长依赖于双重的恫吓或欺骗。一方面，这些阶级由于无知，无权接受了，或在习俗、传统、权威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的压力下，被逼迫、被劝说或被哄骗而接受这样一种局面，即他们只能得到他们通过同自然和资本家的合作所生产的蛋糕中的一小块。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却能把蛋糕中的最好部分归为己有。而且，根据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基本条件，即在实际上他们只消费其中的一小部分，在理论上他们是可以自由消费归他们所有的全部蛋糕的。储蓄的责任成了最主要的美德，蛋糕的增长成了真正的宗教目标……这样，蛋糕真地增加了；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可没有好好想过。

在凯恩斯看来，由私有制造成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正如当时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是战前社会秩序和进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也正如凯恩斯所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进步依赖于工人对于现状的消极的和驯服的接受。然而，“让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生活安逸的广大群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积累是不自然的”。使凯恩斯最为耽心的事情是：工人阶级有朝一日会指责这种欺骗并

试图取得社会的蛋糕的较大部分，从而造成资本家利润的减少。作为社会的革命性改造的前奏，随之而发生的社会动乱将使资本家对未来失去信心，他们将力图在条件还允许的范围内充分享受他们的消费自由，从而加速他们被剥夺的进程。“由于资本家阶级不愿再储蓄，资本积累将不再可能。资本和劳动之间为收入分配而进行的斗争将变得日益尖锐，并将导致公开的阶级战争。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人类从其早期存在之中得到的所有好处都将毁于一旦。”

《通论》中的财富分配问题

以上是凯恩斯在其《通论》发表之前对问题的看法。与《和平的经济后果》不同，《通论》所关心的经济绝非处于其理想的“黄金国”阶段。事实上，资本主义正在迅速接近凯恩斯所一直耽心的大崩溃。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种理论，以解释大规模失业现象并为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提出适当的经济政策。他完全陷入了短期问题，在这样一个时期中，资本存量可以认为是给定的。在这一背景中，收入分配问题被推到次要地位。直到《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才简短地回到收入分配问题上，而且采取了与他早先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完全相反的立场。

《通论》第二十四章的标题是：“关于《通论》可能导致的社会哲学的结论性意见”。资本主义的突出缺陷不仅在于它未能提供充分就业，而且在于“它对财富和收入作了专断和不平等的分配”。^①确实，就业和分配是相互联系的，尽管凯恩斯并没有充分阐明这种关系，尽管他未能如卡莱斯基后来所

① 《就业通论》，“经济学季刊”，1937年2月。

作的那样，以寡占价格理论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通论》中的命题Ⅱ将不再能够成立）提出一种充分发展了的收入分配理论。在《通论》中，凯恩斯重新考虑了不平等分配对保证资本积累能按足够快的速度进行的必要性问题。

首先，他宣称，自19世纪末以来，累进的收入和遗产税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早期“财富和收入的非常巨大的不平等”。但他不愿意附合这样一种观念，即继续依赖这类税收会削弱资本家的个人储蓄动机从而减慢资本的增长。他还更进了一步，现在，他已不再承认“〔资本增长的〕相当一部分依赖于富人由于财产过多而进行的储蓄”。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萨伊定律保证了经济体系在充分就业点上的长期均衡，而所有对于这种美好状态的短期偏离都将因某种力量的作用而被自动和迅速地加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将同较低的消费水平相适应，并且，如果要提高资本积累率就必须进一步降低消费水平。然而，在凯恩斯的《通论》中，经济的充分就业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幸运的偶然。现在，凯恩斯开始主张：当经济处于就业不足状态时，总的消费倾向偏低将妨碍资本的增长。

论证过程中的第二步是把消费倾向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凯恩斯指出：“高额遗产税并不是国家资本财富减少的原因”。只要来自高额遗产税的收入能够使政府降低对收入所征收的直接税，收入分配上的更大平等就将会“提高消费的习惯倾向”，并因而“有助于同时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或者，更概括地说，财政政策可以用来影响收入分配，并把它作为增加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不能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有利于劳动（即使利润份额减少）的较为平等的分配必然会降低资本积累率，从而使劳动者自

食苦果。事实上，考虑到资本主义的通货收缩的自然倾向，相反的看法倒更可能是正确的。

虽然凯恩斯承认收入和财富的显著不平等可以从心理上证明是正当的，但“今天所存在的这种巨大的不平等”却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独特的；

因而，我们的论证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在当代条件下财富的增长远不象通常所假设的那样依赖于富人的节欲；相反，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节欲妨碍了财富的增长。这样，为财富的巨大不平等辩护的一个主要社会理由就被否定掉了。①

同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的早期分析相比，上述论述代表了凯恩斯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收入分配可能是消费函数的一个短期参数，但它很容易变成一个积极的政策变量。因为工人通常花掉他们所赚到的一切，任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强制性收入再分配都有可能提高总的消费倾向，从而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增加实际产出和就业，并导致利润水平的提高。至于这种再分配效应是否大到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则是值得严重怀疑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多么有限，这种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而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则只能会加重，或许会大大加重早已恶化了的形势。

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四年中，供应学派的“理论家们”抱着回到前凯恩斯时代的怀旧心情，顽固不化地试图通过实行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再分配来减少消费，并进而刺激资本积累和增长。这再次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思维习惯，即把经济增长率同所谓低消费、高储蓄的资本家阶级的利润

① 凯恩斯：《通论》，英文版，第372页。

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这些新“理论家”经常咒骂那些过度奢侈的堕落的资本家。他们认为，增长取决于能否执行一种将削减消费的财政政策，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收入分配大大有利于传统的资本家阶级，同时还要对工会实加压力以使其就范。

与此同时，主流派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则要么继续在一般均衡模型上浪费时间——这种模型通过假定资本主义具有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长期趋势而回避了全部现实问题；要么继续在微调模型上浪费时间——这种模型力图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实现那些不能自然而然地加以实现的目标。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作为一种长期趋势的失业灾难，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可以通过执行某种政策而加以解决。循环已经完成，反对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反革命的自鸣得意以及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倒退的理论正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采取的立场。

后凯恩斯主义剩余经济学

现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新李嘉图学派是以庇若·斯拉伐1960年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为基础的。在接受斯拉伐对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完全拒绝的基础上，新李嘉图主义者发展了一种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剩余经济学”的分析性理论内核。

任何经济，如果它打算存在下去，必须至少能够再生产自身，即它必须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并能够更新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了的以前的那部分资本存量。任何超过这两项基本更新要求的东西都是剩余。在资本家（其拥有有形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其出售劳动时间给资本家）之间对于

这种剩余的分配，基本上是一种非常有利于资本家的权力关系。决定收入分配的正是由上述关系所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对称性。而收入分配反过来又提供了要求占有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权力，从而在决定商品价格和要素收入的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状况。简言之，同新古典主义理论相反，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主权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财富的不合理分配以及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不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着商品的价格。更具体地说，价格是以寡占市场力量为基础的，在由历史决定的工资水平之上的加成。而工资水平自身则是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为增加自己的相对份额而斗争的结果。因此，同在一般均衡分析的真空中运行的不存在历史时间的新古典主义的主观价值理论相比，分配理论是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后凯恩斯主义者强烈反对生产函数的概念，其根据是，与土地和劳动的价值不同，资本存量的价值是不能独立于收入分配问题而加以决定的。这样，整个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就垮台了。这就是发生在60年代的著名的资本论争。

有形资本（实际的生产资料）不是一堆同质的腻子；它是不同质的，因而不能在价值上被加总。各种估计资本价值的“现值法”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些方法的使用要以事先知道利息率为前题。而另一方面，确定这种利息率的大小恰恰是理论研究的目的；因而，我们不能事先假定利息率（即利润率，或换言之，资本的工资）。简言之，利润率不能脱离分配理论而独立地加以确定。实际上，新古典主义理论事先假定了它本来应该加以证明的东西。

剑桥剩余学派，特别是其中的意大利分支，是以李嘉图